



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丛书

总主编 刘景泉

张伯苓德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牛文利 著



張伯苓先生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丛书

总主编 刘景泉

张伯苓德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牛文利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伯苓德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 牛文利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7

(南开大学建校 100 周年纪念丛书)

ISBN 978-7-310-05831-0

I. ①张… II. ①牛… III. ①张伯苓(1876—1951)
—德育—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843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4 插页 240 千字

定价:4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牛文利同志的《张伯苓德育思想与实践研究》纳入“南开大学建校 100 周年纪念丛书”出版计划即将出版，值得庆贺！

张伯苓德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教育思想中最突出、最有特色的一部分，专门将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实践作为一个选题方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不但能够进一步开拓张伯苓思想研究新的学术领域，而且有利于深化、细化张伯苓思想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项课题无论是对于加强张伯苓教育思想理论研究，还是继承发扬南开优良办学育人传统，持续推进新时代南开“公能”特色素质教育实践，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纵观全书，牛文利的研究无疑达到了预期目标，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基本框架，呈现给我们的是完整清晰的思想史过程。张伯苓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五岁时开始受到父亲启蒙，学习传统文化，其父并没有采用死记硬背的刻板教育方式，而是注重书本知识和实际有机联系，对他进行耐心教导。这种相对开明的启蒙方式、比较科学的教育方法以及尊重孩子主体意识的行事风格，对日后张伯苓的教书育人模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张伯苓早年连续两次到日本学习考察教育状况，是比较早直接接触并借鉴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校德育概念的近代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办学实践中对德育内涵的理解、对德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以及德育实践探索方面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和个性特征。

在剧烈动荡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张伯苓经过五十余年的呕心沥血，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系列民办学校，构建了完整而独特的南开教育体系，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探索出一条兴学育人、教育救国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张伯苓始终坚持把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丰富提炼，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德育理念和实践方式。

其次，本书提出“公能”德育思想是张伯苓德育思想的核心和标志。以

往对“公能”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校训角度，这方面研究较多，发掘也较深，但是视角相对偏小。牛文利从德育角度审视，认为“公能”德育思想是张伯苓德育思想最为准确最为精练的概括。文章不但对“公能”德育思想的形成脉络进行了梳理，还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透视，向读者清晰展现了“公能”德育思想的全貌。在学校众多育人元素中，校训以其高度浓缩的办学理念、治校精神和文化传统等内涵，而具有十分独特而有效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公能”校训是张伯苓在长期办学育人实践中，体悟凝缩出来的育人理念，时至今日，依然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大学精神的深度内涵，承载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成为新时代培育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和精神资源。2016年12月7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大学需要做到四个“坚持不懈”，在讲到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时，特别提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南开校训。也正说明，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提出逾八十余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历久弥新，承载了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南开表达”的新内涵。“公能”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之处，有利于以校训的传承与践行作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办学实践和师生的校园生活，使之成为指导学校办学、规范师生品行的价值遵循。

再次，本书对张伯苓德育思想的鲜明特色进行了分析概括。主要有三点：一是德育思想与德育实践高度融合，互相促进。张伯苓以教育救国为根本信念，基于一种试验的态度，在利用社会力量创办教育事业过程中，注意把当时社会道德需求与学生实际结合起来，把学生思想道德意识教育与学生思想道德能力训练有机融合，逐步探索和修正其教育理念和德育思想，对德育模式大胆创新，体现出其德育思想高度的创造性和个性化特征，同时也体现了育人理念与育人实践的高度融合。二是校园德育阶段化与整体化的高度统一，衔接有序。张伯苓在实践中建立一个独立于公立学校的从小学到研究生的私立学校教育体系，用“公能”德育思想贯穿校园育人的全过程，针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年龄特征学生侧重点有所不同，既体现出他德育思想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又体现出一定的针对性和差异化。三是在校德育和离校德育相统一的终身德育观。张伯苓坚持对在校学生的道德教育要始终如一，从入校第一天开始，从课堂到课外，全面深入地进行“公能”德育的熏陶和训练，使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学生步入社会、终身发展的奠基石。即使在学生毕业离校后，他依然通过校友会、校刊校报、书信往来和校友聚会等形式把校友紧

密联结在一起，依然以“公能”德育理念勉励校友为社会服务，充分体现了张伯苓坚持终身德育的自觉意识。

最后，阐发了张伯苓德育思想的时代价值。张伯苓在继承发扬我国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吸收融合西方现代德育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经过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既适应中国国情又具有南开特色的德育思想，既有理论深度，又具可操作性，历经岁月的长期洗礼，至今仍具有勃勃生机和活力，从中发掘出的理论及方法，对今天开展德育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价值。本书联系当前学校德育特别是高校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结合2016年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从中发掘出了对今天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借鉴价值，特别是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及开展“公能”素质教育具有启发意义的内容，体现出该研究的现实意义。

2019年，南开大学将迎来第一个百年，在喜迎百年校庆的氛围中，该书的出版无疑是为校庆呈上的一份贺礼。

是为序。

寇清杰

2018年9月

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前 言

张伯苓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以教育救国、兴学育人为己任，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他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系列学校，构建了完整而独特的南开教育体系，以兼收并蓄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探索出一条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张伯苓形成了丰富而生动的教育思想，而他的德育思想和德育模式创新则是其教育思想体系中最为精彩也最有价值的内容，也是中国近代德育思想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德育思想的视角出发探讨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

本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具体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等综合方法，对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形成来源、发展演变、基本内容、德育实践以及主要贡献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归纳。在分析研究基础上，对张伯苓德育思想特色和德育实践过程做出总体评价，概括提炼出张伯苓德育思想与实践创新在南开百年育人历程中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当代德育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当前，我们正在大力倡导德育创新、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依然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生命力和价值阐释空间。

张伯苓以南开系列学校为试验场所开展的德育实践是中国传统德育向现代学校德育演进过程中的极佳案例，是晚清至民国时代教育与社会互动的一个缩影。他比较早地认识到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面对当时历史环境和教育困境，旗帜鲜明地倡导实践“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和教学生“行做人之道”的德育观，尝试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 and 怎样培养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其融合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精华和现代西方德育理论之所长，紧扣时代脉搏和社会需求，形成了以爱国教育思想为基础，以公能德育思想为主线，以南开精神为品格特征，以培

养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能力青年为目标的德育理论框架,开辟了以话剧文化、体育运动、校园文化以及社会实践为代表的德育实践新模式,以实际行动彰显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为国育才、教育救国的初心与担当。张伯苓德育思想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知与行的互相促进,体现了继承、发展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展示出深厚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人格风范,丰富了中国近代学校德育的内容和形式,也体现了德育工作的一般规律。

张伯苓“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德育价值观、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为深入理解和认识今日中国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破解当前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困局,特别是深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德育理论创新都提供了有益启示。即使是其德育思想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和德育实践中所走过的弯路,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反思和借鉴之处。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 论 | 1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1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5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7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及创新之处 | 10 |
| 第二章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形成 | 13 |
| 第一节 张伯苓德育思想产生和形成背景 | 13 |
| 第二节 张伯苓德育思想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 | 21 |
| 第三节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 | 43 |
| 第三章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 72 |
| 第一节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世界观、国家观与民族观 | 72 |
| 第二节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科学内涵 ——人生观、文化观与人才观 | 86 |
| 第三节 张伯苓的道德价值尺度 ——以服务社会的公德与能力为衡量标准 | 99 |
| 第四节 张伯苓全面培育个人道德素养 ——为学生终身成长奠基 | 107 |
| 第四章 张伯苓德育实践及其特色 | 125 |
| 第一节 张伯苓多层次多元化的德育探索实践 | 125 |
| 第二节 张伯苓的角色定位与思想道德教育实践 | 157 |
| 第三节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实践特色 | 169 |
| 第五章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 | 186 |
| 第一节 张伯苓的德育贡献及历史局限性 | 187 |
| 第二节 张伯苓德育思想对当代德育工作启示 | 193 |
| 第三节 日新月异 永远年青 | 201 |

| | |
|------------|-----|
| 结 语 | 205 |
| 参考文献 | 207 |
| 后 记 | 217 |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德育活动是人类最早的实践活动行为之一，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漫漫之路，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生存发展提供重要条件、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①一般认为，“德育”（moral education）一词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特别是随着近代学校的兴起，德育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1860 年，英国著名学者斯宾塞（Spencer）在《教育论》一书中明确把教育划分为智育、德育和体育，将发展智慧之教育称为智育，发展德性之教育为德育，发展体格之教育为体育，德育逐步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使用德和育两个字，但没有合在一起使用并表示道德教育这一含义，只有修身、教化等与德育含义相近的概念，可见德育是个近代传入中国的外来词。部分线索显示，来自近代日本的可能性较大。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量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思想理念，广泛翻译出版《教育论》等著作，在教育方面比较早地接触德育概念，并开始了与德育相关的讨论和著述。如，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1901）在《文明论概略》（1875 年）、《教育的力量》（1876 年）、《德育如何》（1882 年）和《德育余论》（1882 年）等多部著作中都谈到德育问题，并提出体育、智育、德育要全面发展的观点。“德育”一词大约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梁启超于 1901 年撰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曾提到康有为“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皆重焉”^②；是目前见到比较早将德智体三育并提的记载，此间梁启超正在日本躲避“戊戌变法”后的迫害，翻译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晚清官员柯劭忞（1848—1933）曾于 1906 年受命赴日本

① 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7 页。

②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 62-64 页。

考察教育，在年底上奏提出：“学堂培养通才，必当首重德育，著学部堂官，慎选教科书善本，择发明经传有益身心之言，汇为一编，以资教授之道，礼仪之防，尤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①其实，早在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一官方文件中就开始使用“德育”这个概念，正文指出：“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而这部章程正是清代官员张百熙等人参考模仿日本教育学制制定的。1906年，王国维发表《论德育之宗旨》一文，从其履历不难发现他此前也曾去日本学习并翻译过日本教育文献。从以上材料和线索可以推断，“德育”一词是来自西方的教育学术语，先由欧洲进入日本，而后留日学生或赴日考察教育的清政府官员通过学习或者翻译教育著作借鉴过来。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并颁发教育宗旨，提倡注重道德教育，从而使德育不再只是少数学者官员关注的术语，而正式成为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广泛使用的概念。1928年唐钺编著的《德育大辞书》解释“德育为教育之一方面，以儿童之道德心之陶冶为目的”，是“德性之熏陶”。同年，王克仁、余家菊等人所编《中国教育辞书》认为：“道德教育，训练道德品格之教育也。一称德育。”^②可见，“德育”一词进入中国后，在内涵层面很长时间内主要指道德教育。张伯苓早在1903年和1904年连续两次到日本考察教育，也是比较早直接学习和接触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校德育概念的近代知识分子之一，在办学实践中对德育内涵有直观而形象的理解，在德育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对接以及实践探索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个性化特征。

张伯苓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经过五十余年的呕心沥血，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系列民办私立学校，构建了完整而独特的南开教育体系，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探索出一条教育救国之路。著名学者张岂之曾指出，20世纪我国教育家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就是张伯苓，可见张伯苓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然而，目前关于张伯苓的研究远未与此相称，即使已有成果也大部分都集中在他的教育思想方面。教育思想是综合性的，研究对象包罗甚广，而德育作为“成人”的教育，是教育的灵魂，德育不但是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社会道德要求的重要体现，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或适应社会道德要求而进行的思想政治道德方面的知识性及规范性教育。德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魅力不仅在于抽象与理性的概念，而更在于其连接着具体生动、有生命的个人

^① 《大清历朝实录》卷之五百六十七（图书馆电子版）（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六十七/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下）。

^② 王世凤：《德育概念源流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

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将人的社会化与社会道德原则的内化贯穿于一体,为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开辟新的途径。所以,长张伯苓八岁的另一位同时代大教育家蔡元培也曾说:“道德之本,固不在高远而在卑近也。自洒扫应对之退,以及其他一事一物一动一静之间,无非道德之所在。”^①张伯苓德育思想作为其教育思想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其教育思想中最突出、最有特色的一部分,专门将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实践研究作为一个选题方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不但能够进一步开拓张伯苓思想研究的学术领域,而且有利于深化张伯苓思想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德育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无疑是以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条件的。张伯苓兴学育人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思想文化经历巨变的时代,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中国传统文明道德、价值取向和近代西方文明的相互碰撞与冲击、融合与吸收都反映到当时的学校德育思想与实践当中。张伯苓作为这个时代的教育实践家,其在学校德育方面的所思所想,在德育具体实践方法和途径方面的探索创新,不仅成为这个时代德育生态的一个缩影,还引领学校德育一时之潮流。聚焦于张伯苓在南开系列学校的德育实践,针对这个具体而生动的案例,从德育视角进行梳理剖析,对德育环境变化、德育思想的形成、德育内容的调整以及德育观的形成等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探索,能为当前德育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充分借鉴。同时,德育思想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是在充分吸收借鉴本土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合外来先进思想理念,经过长期的育人实践和深入认识反思后才逐渐形成的。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显著特点正是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变迁。他的德育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关于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德育伦理学卷》指出:“首先是注重内心的自我修养,强调道德的自觉;其次是强调知和行的统一,为学和践履的一致;再次,德育与宗法政治融为一体;第四,教人如何做人是中国德育思想又一显著特点。”^②而近代德育产生于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经严复等启蒙思想家撰文介绍,加速了中西文化思想的融合。蔡元培 1912 年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提出“五育并举”方针,把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改造封建教育,

① 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金城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3 页。

② 罗国杰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德育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8-160 页。

以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来阐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观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时的张伯苓，在借鉴日本教育模式基础上，已经创办并经营南开学校长达八年，积累了一定的教育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成型的德育理念。他面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型，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从德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吸收西方教育理念和德育精神，在实践中推动中西德育的结合与改造，无疑是一个兼具理论思考和实践价值的重要命题，由于张伯苓德育思想研究基础还较为薄弱，这些还无法充分而系统地反映到近代德育史编纂中。此外，只有当我们把张伯苓为实现育才救国理想，所形成的德育目标、原则、内容和方法还原到国家内忧外患深重、社会时代剧烈变革、民众观念保守落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可能对这些看似枯燥的术语形成鲜活而生动的认识。

同时，理论认知和发掘的价值不仅在于体系的构建，更大的价值在于社会应用和指导实践。张伯苓在继承发扬我国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吸收融合西方现代德育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经过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探索和积累，形成了一系列既适应中国国情又具有南开特色的德育思想，既有理论深度，又具可操作性，历经岁月的检验洗礼，至今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从中发掘出的理论及方法，对今天开展德育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正如2013年2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梁吉生教授的一封回信中指出，突出强调研究张伯苓思想和南开教育“必须同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真正做到在继承中得以发扬光大”。2017年1月10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办好中国大学需要做到四个“坚持不懈”，在讲到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时，充分肯定了校训所蕴含的独特价值，还特别提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南开“公能”校训是张伯苓在办学育人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核心育人理念，时至今日，依然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深度内涵，承载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成为培育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和精神资源。本选题对南开而言也具有特殊意义，南开中学作为南开系列学校中首个成员已经迈入新世纪，而南开大学也迎来了第一个百年华诞，这项课题无论对于深化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还是发扬南开优良办学育人传统，探索推进新时期南开“公能”特色素质教育，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对于张伯苓教育实践及相关思想的总结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庆祝张伯苓 70 周年诞辰出版了纪念文集 *There Is Another China: Essays and Articles For Chang Poling of Nankai* (译作《另一个中国: 张伯苓七十寿辰纪念文集》, 1948 年), 由 13 位中美学术界知名专家共同撰写了 12 篇论文以纪念张伯苓, 胡适所撰写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成为后来者研究张伯苓的重要文献, 就出于此书。1951 年,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张伯苓追悼会上的讲话稿《一代人师张伯苓》, 以及台湾南开校友王文田撰写的《张伯苓与南开》(1968 年)、孙彦民撰写的《张伯苓先生传》(1971 年) 以及 1976 年台湾南开校友会编印的《张伯苓先生百年纪念册》, 都为今天深入研究张伯苓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张伯苓教育思想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政府和学者对张伯苓及其教育思想重新评价, 史料梳理和研究工作才得以逐步展开, 并取得一定成果。在史料方面, 具有代表性的分别为王文俊等选编的《张伯苓教育言论集》(1984 年)、《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1989 年)、崔国良主编的《张伯苓教育论著选》(1997 年)、梁吉生编写的《张伯苓年谱长编》(上中下三册, 2009 年)、《张伯苓私档全宗》(2009 年), 至此史料挖掘整理已颇具规模。与之相应的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著的《张伯苓纪念文集》(1986 年)、侯杰等撰写的《百年家族: 张伯苓》(2004 年)、宋璞主编的《张伯苓在重庆》(2004 年) 等部分传记、回忆性文章, 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丰富、充实了研究资料。特别是 2015 年南开大学编辑出版的 10 卷本《张伯苓全集》, 几乎将现有所见张伯苓个人著述言论、公文函电、学校规章制度等各种材料全部囊括, 为全面深入研究张伯苓及其南开教育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也为本课题研究张伯苓德育思想提供了极大便利。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关于张伯苓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学科领域, 以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思想、办学思想、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多。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方面, 代表性著作包括梁吉生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1994 年)、《张伯苓的办学理念》(2006 年); 代表性论文包括梁吉生的《试论张伯苓的教育思想》(1980 年) 和《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1981 年), 郭建荣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1996 年), 原志

良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评价》(1996年),张岂之的《未完成的课题:关于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研究》(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包括王会晓的《张伯苓高等教育思想研究》(2007年)、刘彦君的《张伯苓中学办学理念初探》(2010年)。在教育管理思想方面,代表性文章有程斯辉的《张伯苓管理思想评价》(1998年)。在人才教育思想方面,代表性成果有严加红的《教泽广布绩著南开——张伯苓人才教育思想述评》(2004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增加,有人开始对张伯苓教育思想进行拓展研究,进而关注到张伯苓的体育思想和德育思想,前者包括邢纯贵等撰写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体育思想及其实践》(1996年)、王景丽的《张伯苓学校体育思想及实践研究》(2010年);至于德育思想方面,代表性成果则有杨庆晨的《张伯苓注重德育教育》(2003年)、高巍翔的《张伯苓的德育观与国民性改造》(2007年)、李宗健等撰写的《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2009年)、杨景玉的《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及实践》(2015年)等文章。直到2013年,首次出现两篇研究张伯苓德育思想的硕士学位论文,一篇是曾宇乔的《张伯苓德育辩证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初探》(2013年),侧重于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解读张伯苓的德育目标、内容及过程;另一篇是贾玉的《张伯苓的大学德育思想》(2013年),集中对张伯苓主张的大学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及途径进行论述,以上成果虽各有特色,体现一定的深度,但总体而言,仍然缺乏对其德育思想及实践活动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分析和研究。

以“张伯苓”和“德育”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从2002年到2017年初,篇名中同时含有这两个关键词的共计10篇研究论文,专门论述张伯苓德育的硕士学位论文仅有上述2篇;以摘要模式检索,同时含有“张伯苓”“德育”两个关键词的共有22篇文章和6篇硕士学位论文。可见,对于张伯苓德育思想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不仅体现在文章数量较少,挖掘深度不够,而且这些研究多是集中在张伯苓关于德育的警句名言或者“公能”校训等微观层面展开,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还远远不够,而对其德育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变化进行全面梳理、分析的研究就更微乎其微了。这也不难理解,在当代教育家教育思想研究及德育思想研究中,诸如周川《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精神》等的近代教育史著作,都将张伯苓德育思想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多是点到为止,在目前已知的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三部《中国德育思想史》中,几乎没有涉及张伯苓这个重要人物,从侧面也反映出张伯苓教育思想特别是德育思想研究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